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04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谢俊如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倡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将农业合作化作为发展农业经济、改造农村社会的有效路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张通过集体化和工业化来不断丰富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内涵,以全新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作为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从历史维度考察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发展历程与演变逻辑,对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9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5-0030-07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不断向前探索的奋斗史。实现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解放,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标。毛泽东一方面主张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农民土地所有制到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最终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主张以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实现农业的社会变革和技术变革,为农业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发展动力,以期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作为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所做的实践探索,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尝试。厘清其实践路径、把握其独特价值,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认识到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求解近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变革既是解

决农民问题的前提条件,也是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认识到了合作社组织是保障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主张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的局限性,将农业合作社逐步发展成完备而系统的基层组织,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逐步消解封建宗法制度下农民的小农意识,重构农村的社会经济基础。

首先,毛泽东主张通过土地革命重新分配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从而为农业合作化奠定基础。毛泽东起初主张在不没收一切土地的前提下,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①事实上,这就是在保留自耕农、中农土地的基础上没收出租的土地。因此,毛泽东最初的主张并不是没收一切土地,直接推行土地国有制。在“八七会议”中,毛泽东指出应制定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的土地问题,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并未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指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②。在与农民代表商谈关于土地革命的问题后,毛泽东最终拟出“土地纲领”草案,提出要“没收一切土地”^③。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

收稿日期:2021-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KS002)

作者简介:谢俊如(1995—),男,广西荔浦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1928年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但随后的事实证明,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不断重新分配土地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1930年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特质、阶级构成、经济关系及实际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这不仅为毛泽东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整土地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也为毛泽东在革命期间发展农民经济和制定农民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毛泽东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了不同的土地政策,并最终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①这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准备好了前提条件,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毛泽东主张农业合作化是保障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始终坚持推动农业向现代化迈进。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了在农民协会基础上创建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的必要性,并指出“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②。随着苏区土地改革的不断展开,自1931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苏区农民逐步创建了劳动合作社、耕田队等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将农业合作社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苏区农民的经济生活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社组织的共同作用下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毛泽东指出,“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同时他也强调要重视“组织耕牛合作社”、建设水利事业以及“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③。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合作社是“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是避免因“分散的个体生产”而导致的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的唯一办法^④。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没有农

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⑤由此可见,毛泽东强调既要充分发挥劳动者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上的重要作用,又要重视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上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他始终以合作社作为农民发展经济的重要组织,并且注重改善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坚持推进农业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主张加强党对合作社的领导,通过农业合作化对农村进行社会改造,以农民的组织化不断消解农民的小农意识。在毛泽东看来,农民合作社这一组织力量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农民拒绝城乡贸易和拒绝工业品入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这是农民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方法^⑥。但应该看到,农民合作社的成立是为了反抗封建旧秩序,而他们拒绝工业和城乡贸易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封建制度,在客观上又阻碍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随后在1927年4月,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提出:“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⑦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农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的倾向以及减少在乡村阶级分化时对农民的压迫^⑧。正如国外学者施拉姆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坚持在中国革命中将农民阶级这一革命力量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⑨。

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缺乏组织性,其关键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以家庭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小团体主义^⑩。概言之,农民通过土地获得生存,但地主乡绅和宗法家族的存在将个体农民束缚于土地之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

⑨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⑩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上,并使其丧失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性。因此,恢复农民的主体性、建构农民阶级的组织性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塑造农村的社会关系。于是,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成为毛泽东改革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重要突破口。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也能促使农民在政治、文化、卫生上获得进步和提高,并且能够改造流氓以及改变农村风俗,再加上生产工具的改良,就会使农村社会逐步建立在“新的基础”^①之上。而“毛泽东这种‘组织起来’的思想,无疑是维持传统社会运行的小农意识的一种格式塔转换”^②。

毛泽东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属性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将中国农民从传统社会中抽离出来并置于一條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之上。正如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已然从“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发展成为“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③。合作社无疑是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样态、农业经济基础进行重建的重要催化剂,中国农村社会通过农业合作化开始显现出超越小农生产方式但又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的现代性特征。但毛泽东也指出,合作社和工厂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的不断发展必然使得农村生产力不断脱离农村而涌入城市,因此合作社和工厂也就分别承担起“巩固家庭”与“走出家庭”的任务^④。简言之,“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⑤从这一层面看,尽管毛泽东拒绝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然契合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一般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身的内在特性,如在经济层面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预设了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必然性。在

此过程中,毛泽东依然将改造农村社会和推动农业的现代化承载于农业合作化,并使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彰显。

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改革,这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需求、刺激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农业经济亟待进一步改革,一方面需要避免因土地私有制而产生的农民贫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需要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借助现代化工业迸发新的活力。

首先,毛泽东主张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避免农民产生两极分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农民所有制固然是农民自身的生活得到保障、刺激农业经济发展的必要一步,但土地私有制带来土地的自由买卖不仅导致了农民内部的两极分化,使广大贫下中农生产积极性受挫,而且滞留了原本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的资金和资源。这些消极影响在中国人多地少、农民土地占有欲望强烈的历史背景下被不断放大,阻碍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1953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⑥

除此以外,无论是从物质积累层面或是价值理念层面上看,小农生产方式都无法依靠自身实现现代化,更无法承担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先实现农业集体化再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农业发展思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协作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创造一种“集体力”的生产力^⑦。协作不仅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而且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进而“会节约非生产费用”^⑧。因此,就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7页。

②张明:《反帝反封建: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前提》,《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6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1079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23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农业经济发展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集体化形成一种集体协作的力量对于克服农业生产落后困难的局面、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从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从互助组逐步发展到高级农业合作社。这不仅实现了农村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初步解决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社会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毛泽东主张要从社会整体经济层面的战略视角思考农业的发展问题,在充分肯定农业合作化为工业化提供物质积累的基础上,认识到工农业失衡的严重弊端,提出要坚持工农业均衡发展并注重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就国家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农业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农业提供大量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其工业品也需要农村这一广大市场。因而,有效发展农业经济可谓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基础性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发展农业经济应当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①。即需要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革,通过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结合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中国也因仿照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而陷入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失衡的困境。于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要立足于长远利益把握工农业发展的辩证关系,提出要以“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方法发展重工业,这样不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②。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强调,要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正确处理国家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要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在生产问题上就要确保“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与合作社保持“灵活性和独立性”相结合,在分配问题上就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的基础上正确调节国家税收、合作社的积累以及个人收入三个方面的矛盾^③。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借鉴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经验教训,要在以重工业为主的条件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正确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就可以不断巩固合作社并维护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进而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巩固国家政权。

最后,毛泽东主张在工农业并举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丰富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内涵,以期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过程中指出,农业合作化对于农村劳动生产力的解放表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量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④。而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通过集体化和机械化的融合,就会使工农联盟进入一个“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随着“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使得工农差别逐步消失^⑤。在毛泽东看来,通过依托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不断扩张农业生产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并以此吸纳农村劳动力,将农民转化为国家的农业工人,逐步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概言之,就是通过农业机械化“把农业上剩余的劳动力就地转化为工业劳动者,逐渐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小城镇人口”^⑥。与此同时,在1955年,毛泽东就全国农业问题与部分省委书记交换意见并共同商定了“十七条”,并主持生成了系统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由此,毛泽东将整体改善农民生产方式和农村综合环境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为农村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合作社和工厂依然作为社会的基础,但与之前所持观点不同的是,毛泽东极力促成合作社与工厂在农村地区相结合,并由此形成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独特意义在于,“它力图接通农村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的一致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册)》,1998年版,第119页。

⑥唐振南:《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及其对“人民公社”失误的纠正》,《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性脉动,以期实现城市化与农村繁荣的同步发展”^①。在毛泽东看来,此时被赋予新内涵的农业合作化成为其破解在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过程中所遭遇的“三大差别”困境的钥匙。而伴随着“三大差别”的逐渐消失,农民也将会主动地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抽离出来走向现代社会,从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自身的现代化。毫无疑问,这需要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力量作为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物质基础之间的现实矛盾也在迫使毛泽东竭尽全力地寻求中国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的可能性^②。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③。即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④。于是,在毛泽东看来,相较于资本主义而言,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在于劳动人民的主体自觉意识。从这一层面来看,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重视生产管理、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发挥集体化的合作力量,从生产关系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然而,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毛泽东因急于求成而强行突破劳动主体的自觉意识,加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验不足等主客观因素而偏离了实事求是原则,最终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一系列失误。

三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解决农民问题、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具体措施,在其实践过程中所彰显出的始终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等特征对于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工农关系问题、

城乡关系问题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来说都是极具价值和意义的。与此同时,习近平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⑤工农关系问题和城乡关系问题应当说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长期存在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以史为鉴,正确处理工农关系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必须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基础上积极摸索、谨慎对待。

首先,农业现代化要放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思考,要坚持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性作用,以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发展为核心,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起来。毛泽东始终强调发展经济要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高度出发,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⑥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以集体化的力量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为农业生产提供最为基础的保障,另一方面要注重以工业化的力量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带来全新生产力。除此以外,毛泽东还强调提高生产力要注重物质技术和精神作用的结合,在劳动生产中要充分发挥劳动主体的积极创造性,要以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的结合提高劳动主体的生产积极性^⑦。总体而言,毛泽东更加注重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发展,更强调从整体利益、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层面把握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关系。但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条件下,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直接导致了平均主义,既没有得到公平又丧失了效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民自主经营两者的积极性充分结合起来。这有效避免了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平均主义,同时拥有自主经营权也让农民在发展经济上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随着社会经

①徐俊忠:《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探索再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②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了快速发展的必要性,例如毛泽东在1956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中指出,中国“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具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册)》,1998年版,第442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册)》,1998年版,第448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册)》,1998年版,第96页。

⑦尚庆飞,罗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济的发展,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从我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前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之外,还需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也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再到以“三次分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基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变化所做出的具体判断。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征程上,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①。因此,要正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出台配套的政策制度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在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起来。第一,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既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又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切实执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在初次分配中做好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第二,必须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②一方面,解放、发展生产力是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是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如果说效率意味着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性,那么公平就意味着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可持续性。从这一层面来说,效率和公平都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基于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并积极从制度政策层面不断完善再分配环节,以完善的协同配套的分配模式解决我国当前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问题。

其次,以各地农村特色优势为基础,依托高新

技术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创建新型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中国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工业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主张以社会主义工业全面反哺农业,从生产领域层面对农村社会属性进行彻底改造,以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彻底解决工农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但也应该看到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显现,“三农”问题渐趋显著,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④在此之后,“三权分离”的土地创新制度推动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责任制凸显的同时有效地促进了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推进了多元经营模式的发展。这从土地所有制层面为破解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题准备好了前提条件。这也是在新时代下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立场、强调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坚持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前提。

“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⑤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这是从全局高度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进一步具体地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举措。但应该看到,我国农耕文明底蕴深厚、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不同区域差异化明显,尤其是底蕴深厚的农耕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决定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具有独特性、艰难性、开创性。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决不能简单套用模板,而是要以农村自身条件为依据,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农村发展带来新动力,在坚持实事求是、不懈探索中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的现代化。

最后,农业现代化应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从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②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1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

农民的根本利益入手,以实现农民主体的现代化为最终目标。从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路径上看,毛泽东拒斥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掠夺式的工业化道路,这彰显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价值属性,即工业化既是城市的工业化,也是农村的工业化。作为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农民和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毛泽东也强调农民阶级具有“二重性”,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但毛泽东也强调,只有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全面发展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致完全地改变过来”^①。毛泽东甚至指出:“看到农民增产,我高兴,农民有就等于国家有。”^②毋庸置疑,毛泽东始终将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整个社

会经济发展的全局高度把握和解决“三农”问题,逐步将农村和城市整体统筹为有机整体。另一方面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入手,在坚持土地公有制、落实土地承包制度的基础上,从农民和土地、集体和国家的关系等多重维度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落实到农民主体的现代化之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农业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群众有更高的期待,需要对农业农村提出更高要求。”^③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以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导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在新时代、新阶段,要逐步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新发展阶段之间的适应关系,让农民有切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Mao Zedong's Though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XIE Jun-r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o Zedong emphasized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Leninism as an effective path for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transforming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o Zedong advocated enriching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through collectiv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aking a new form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s a concrete way to explor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vestigating Mao Zedong'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thought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volution logic 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is of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ce for adhering to the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and maintenance of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peasants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册)》,1998年版,第97—9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8页。